

2009-2017 年间大陆台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通论及近代以前部分)

陈忠纯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2009 年以来，大陆地区台湾史研究领域的研究力量和条件继续得到改善提升。体现在几个方面：1、研究队伍得到加强，研究生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如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室、福建省闽台缘博物馆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逐年扩充，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台湾史专业研究生招生数量也有增加。2、新的涉台文史刊物出版，其中以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办，近代史所台湾史研究室编撰的《台湾历史研究》；福建省闽台缘博物馆主办的《西岸》(后改为《闽台缘文史集刊》)；闽南师范大学闽台文化研究所主办的《闽台文化交流》等刊物的较具质量及影响。3、涉台文史研究得到国家的重视，年度获得立项资助的台湾史领域课题不断增多。

在机构、刊物、经费都有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大陆台湾史研究继续得到较为长足的发展。以下从期刊论文、专著、论文集及史料整理等方面，对 2009-2017 年间大陆台湾史研究(通论及近代以前部分) 做简要的梳理。¹

一、大陆台湾史研究通论部分概述

陈小冲教授在 2009 年发表的《近年来大陆地区台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所统计的台湾史论文，涵盖了 CN 刊号的正规学术杂志和正式出版的论文集。但 2010 年来，大陆

¹ 作者简介：陈忠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创新团队成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台湾史研究发表的论文数量已大大超越以往，各类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数目繁多，且因大陆的学术统计标准，参会论文在论文集出版之前，多以单篇的方式先行发表，以此之故，短期内要对各类正式出版的学术论文做全面的收集整理，恐力有未达。为此，笔者选择大陆地区学术期刊收录最为全面及时的 CNKI 数据库作为主要出处，检索 2009 年至 2017 年的相关学术论文。首先，本文就近年大陆台湾史研究中通论部分的内容稍作介绍。据笔者所见，近年来在期刊发表的通论性论文大致有 19 篇左右，研究主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

不过，有关台湾史通论部分的成果主要还是集中于专著或编著类。笔者自检索大陆国家图书馆检索到 21 部相关著述。其中，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连续出版了两部张海鹏与陶文钊合编的台湾通史，即《台湾简史》和《台湾史稿》。²《简史》偏向于学术普及读物，《史稿》则属于学术研究成果。两书借鉴已有的学术成果，在分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写成平实客观的著述，并致力传播严谨的台湾历史知识，检讨台湾经济起飞的成因，研究西方列强侵略与台湾发展的关系，探讨重大问题的成因，剖析台湾的发展走向。《台湾简史》对近百年的历史作简明的概括与分析；《台湾史稿》分上下两卷，共计 108 万字，有别于以往着重清代台湾的历史，该书采取详今略古的写法，将台湾史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并将重点置于日据时期和光复以后。

通史性的著述还有如张春英主编的《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史》(上下两卷)，该书立意系统研究两岸的历史渊源与现今两岸关系形成、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展示两岸相依相存的历史事实。³林仁川教授等主编的《中华文化地域通览·台湾卷》对台湾文化做了较全面的论述，指出台湾文化虽然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其主要影响来自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从而

² 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简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年；《台湾史稿》，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年。

³ 张春英主编：《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

形成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并含有一些次文化的特征。”⁴此外，还有诸如程朝云的《台湾史话》、杨益茂等编著的《台湾——历史与现状》以及杜辉的《据有他者：帝国、知识与台湾原住民物品收藏实践(1840-1945)》、龙金顺等编译的《近代闽台社会风貌〈教务杂志〉文章选译(1867-1941)》等不同领域的论(编)著。⁵

通论性著述还有张海鹏、李细珠合编的《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和等。《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一书是大陆地区首次系统梳理和总结了1949-2013年间大陆地区学界对台湾史的研究状况，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关于台湾通史撰写及台湾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宏观问题的讨论，第二至第六章大致按时段叙述不同时期对台湾史的学术研究状况。每章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按问题评述重要研究论著的学术贡献，理清相关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二是概述重要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情况，提供相关研究资料的线索；三是指出既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指明新的研究方向。⁶

有关台湾历史的宏观叙述及史观探讨，以陈孔立教授的著述最丰也最具影响。2013年，陈孔立教授出版了论文集《台湾史事解读》，该书在第一部分讨论了台湾研究的史观与方法论问题。作者认为，由于两岸分隔多年，在史观上存在不同看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两岸现有不同的史观与政治立场分不开，进而导致了认同问题。作者提出，两岸有必要建立台湾史研究的交流平台，应该“通过学术讨论，取长补短，共同提高”。⁷陈孔立教授以“兼顾史观”总结许倬云教授在其《台湾四百年》中提到观点：“我对台湾的观察和体验，也是既非

⁴ 林仁川、卢美松主编：《中华文化地域通览·台湾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⁵ 程朝云著：《台湾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杨益茂、宋桂芝等编著：《台湾——历史与现状》，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杜辉著：《据有他者：帝国、知识与台湾原住民物品收集实践：1850-1945》，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龙金顺等编译：《近代闽台社会风貌〈教务杂志〉文章选译(1867-1941)》，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⁶ 张海鹏、李细珠主编：《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⁷ 陈孔立：《台湾史研究的史观问题》，自氏著：《台湾史事解读》，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

完全台湾人的，也非完全大陆人的，而是尝试着两面兼顾，所以看得较为清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两岸“共同史观”的可能性。他说：“建构共同史观并不是要建构一种完整的史观来取代现有的各种史观，而是要吸取各种史观中若干双方可以接受的基本要素，形成具有两岸特色的共同史观。这种史观需要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步到位建立起来的，而是逐渐积累。随着两岸共识的增长不断地添加双方可以接受的要素，不断地充实其内涵，逐步形成共有观念，增进互相认同。”⁸

二、大陆台湾史研究近代以前部分概述

近代以前部分的大陆台湾史研究包括了早期台湾史、荷据台湾史、明郑台湾史和清代台湾史，以下分别予以详细说明。

（一）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情况概况分析

荷据以前的早期台湾史研究搜索词比较难以确定，笔者以主题词“台湾”，加“全文”项“远古”，或“岛夷”，或“流求”等词，分别录得 38 篇、45 篇和 49 篇。⁹荷据与清代时期则采取主题词“台湾”，加“全文”项“荷据”或“清代”，分别录得 69 篇与 872 篇。由于检索关于明郑时代的研究论文时，容易与荷据及清代时期的文章重复，故笔者改用“明郑”作为主题词，检索到 17 篇论文，加上其他检索项的参照补充，总共搜集到 20 篇涉及明郑时期的研究论文。经过逐篇筛选，笔者大致检索到早期台湾论文 35 篇，明郑时期 18 篇，荷据时期 22 篇，清代 435 篇，跨时段通论 19 篇（其中仅涵盖近代以前的论文有 7 篇）。当然，考虑到使用其他词搜索还会查询到更多的结果，以及还有其他正式出版的论文集等，过去十年间的台湾史研究方

⁸ 陈孔立：《建构两岸共同史观的尝试》，《台海研究》2017 年第 2 期。

⁹ 使用“远古”“岛夷”“流求”等词，分别检索出，其中多有交叉，虽难以统计精确篇数，大致总数应该在 30 篇上下。

面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无疑超过本文统计的数据。据笔者估计，研究清代时期的论文数可能会超过 600 篇。这还有待于未来更详细精确的梳理。

“主题”项 \ “全文”项	“全文”项	“远古”“岛夷”“流求”	“荷据”	“清代”
“台湾”		35	22	435

表 1：2009-2017 年间，有关早期台湾、荷据时代及清代时期的正式发表论文数目情况

通过检索我们还可了解到，2009 年以来，大陆台湾史研究的成果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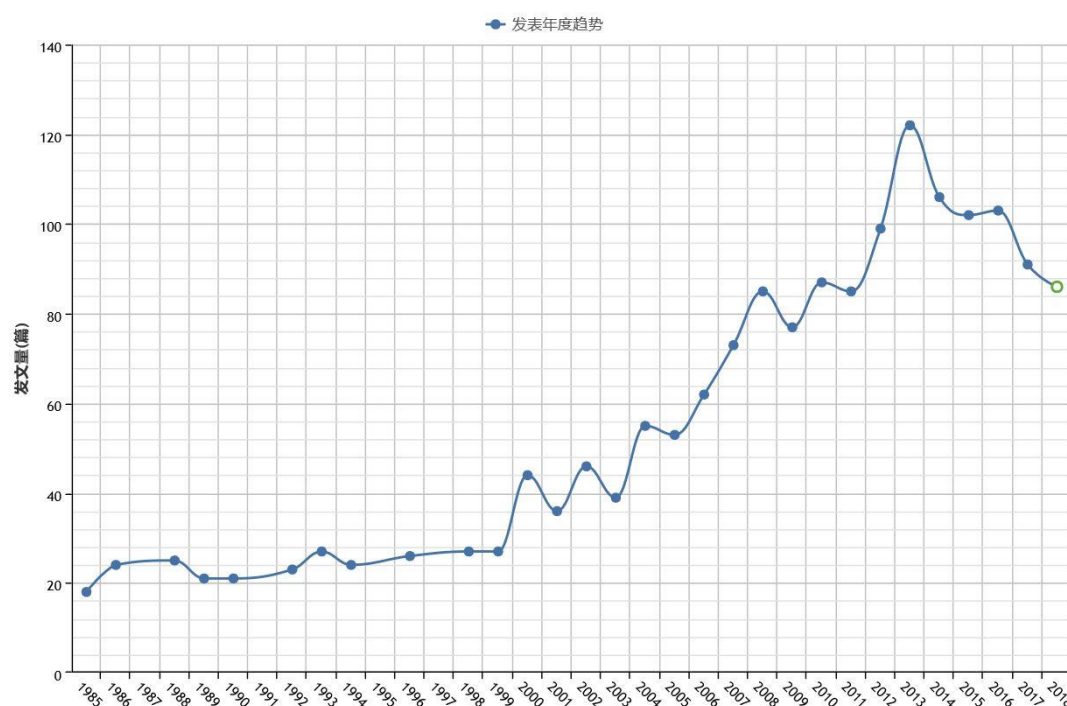


表 2：1980 年以来，大陆地区期刊清代台湾史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变化趋势 (检索方式：“台湾”【主题词】+“清代”【全文】)

式：“台湾”【主题词】+“清代”【全文】)

从上图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大陆地区刊发的清代台湾史研究论文开始明显增长。2009年以来，稳定在每年80篇以上，近5年更达到100篇上下。其他时段的台湾史研究虽然绝对数量没有这么多，但增长趋势同样明显。

从相关研究的领域看，早期台湾史主要集中于考古文化和原住民的宗教习俗，其他时期则比较均匀，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及人物研究所占比例较高，而以往比较受重视的经济史研究，有趋冷之势。

时代 研究领域	早期台湾	荷据台湾	明郑台湾	清代台湾	跨时段 (仅涵盖近代以前)	总计	占总 数比 例
政治军事史	5	7	5	66	1	84	16.2%
经济史	0	3	3	31	3	40	7.7%
社会史	0	6	0	81		87	16.8%
文化教育史	16 (典籍 研究 5)	3	5	138 (典籍 研究 33)	3	165	32%
宗教及民间信仰	9	0	0	46	0	55	10.6%
人物	3	2	4	53	0	62	12%
其他	2	1	1	20	0	24	4.6%
总计	35	22	18	435	7	517	100%

表 3 各时段各领域研究论文的分布情况

从研究领域中还可以看出，大陆台湾史研究十分注重两岸历史渊源的考察，相关论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探讨了大陆各省或地区与台湾的历史联系，进一步拓展了台湾史研究的地理空间。同样，原住民的历史得到相当的重视，笔者收集到有关原住民的论文有 69 篇，说明近年大陆台湾史的研究重点日趋多元。

研究领域 \ 时代	早期台湾	荷据台湾	明郑台湾	清代台湾	总数	占总数比
原住民	13	7	0	49	69	13.3%
两岸关系	17	6	5	116	144	28%

表 4 有关原住民研究与两岸关系研究的论文数量及所占比

以下就近代以前台湾史各阶段研究的代表著述稍作介绍。在早期台湾史研究中，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揭示早期大陆政权如何经略台湾及原住民与大陆的文化渊源。徐晓望在新发现的北宋李复的书信中，找到当时的流求国对待华人很客气，设馆招待的记载，并结合其他史籍及地理常识，推断北宋时期的“流求国”是台湾北部的十三行文化的主人。¹⁰徐晓望在另一文中，论证元代出兵“瑠求”的出发地“汀路尾澳”，应即是在澎湖的内港之一“风柜尾澳”，而元朝水师长期在澎湖驻扎，说明澎湖不仅是“泉之外府”，而且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其目的是震慑台湾海峡的海盗，确保泉州航路的通畅。¹¹

鲁西奇教授在《流求王欢斯渴刺兜：台湾历史上的“印度化时代”》一文中，认为 6 世纪后期至 7 世纪初，统治台湾岛（或其部分地区）的流求王族很可能来自扶南，并提出台湾历

¹⁰ 徐晓望：《论唐宋流求与台湾北部的十三行文化》，《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年第 1 期。

¹¹ 徐晓望：《元代瑠求及台湾、澎湖相关史实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 年第 4 期。

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短暂的“印度化”时代。作者依据《隋书·流求传》《太平寰宇记》《梁书·扶南传》《南齐书·扶南传》《晋书·扶南传》等文献,认为《隋书·流求传》所提及的流求国,有两种人群和文化因素:一种是来自扶南、居于统治地位的王族,他们“深目长鼻,颇类于胡”,其表现出来的印度文化特征仅是一种上层社会的文化,影响范围较小;另一种是土著的“夷洲”人群,“人形短小”,其文化代表了台湾本土的文化,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根基。因此,扶南裔流求王族统治下的流求文化可界定为“印度—夷洲文化”。¹²张崇根教授认为依据考古学与现代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源流关系说,支持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多元来源的观点。他在《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源于东夷说述论》中着重论证其中的“东夷说”,台湾世居少数民族与古代聚居于靠近渤海、黄海的海岱地区的东夷人有着较多相同的文化特质,故可能主要源自东夷。¹³周运中考察了史籍上记载的南宋时期侵扰澎湖和泉州的毗舍耶人和谈马颜人,认为前者可能是从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迁居到台湾南部平原的放索人,依据是米沙鄢人与放索人体貌、风俗完全吻合,且毗舍耶即放索的异译。而谈马颜人则是台南的雅美族人,他们可能是从巴布延群岛北迁到兰屿。¹⁴

吴春明教授考察了阿美族卑南群的都兰部落人的“树皮打布工艺”,并比较华南、东南亚和太平洋土著树皮布文化,指出阿美族、傣族、黎族、布鲁-云侨族、南岛语族等树皮布文化有基本的共性,又同处于古代百越-南岛土著文化共同体范围内,印证了汉文史籍所载“南蛮”民族之“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统一性,反映了树皮布文化从亚洲东南海岸地带产生、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地带传播、发展的逻辑进程。¹⁵

¹² 鲁西奇,《流求王欢斯渴刺兜:台湾历史上的“印度化时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5期。

¹³ 张崇根:《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源于东夷说述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2期。

¹⁴ 周运中:《南宋台湾毗舍耶人与谈马颜人新考》,《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1期。

¹⁵ 吴春明:《台湾阿美族的“织树为布”工艺及其文化史意义》,《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民族考古新证》,《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1期。

荷据时期台湾史方面的研究，有赖于近年来《热兰遮城日志》《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等西方材料的发掘、翻译，相关研究得到一定的进展，尤其其当代历史人物、台海地区贸易往来等情况较之以往更加清晰。张彩霞、林仁川利用上述资料，质疑以往认为欧洲人主导了17世纪台海贸易的观点，并从贸易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主导贸易商品定价、制定台海贸易市场规则等三个方面分析，认为当时台湾海峡贸易市场的主导权掌握在郑芝龙等中国海商手中。¹⁶黄俊凌则认为以往由“华商”或“荷兰东印度公司”单方面主导的观点不能全面反映实际的情形，当时的贸易主导权应是在明朝私人海商和荷兰殖民者之间转换，且受明朝与日本海外贸易政策的宽、严，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殖民势力的介入程度，华商集团内部的分化和竞争，明朝政局变化对商品生产的影响等多种因素交叉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¹⁷陈思考察了颜思齐、李旦等人与荷兰人的关系，他认为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海地区后，颜思齐与之建立了广泛的往来交流，双方一度合作密切，但很快便趋于疏远，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与李旦有关。在这段微妙关系的背后，体现的是当时福建地方当局、民间海上势力与西方殖民者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¹⁸

刘彼德利用《巴达维亚城日记》《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等材料，论述了荷据时期的台湾社会结构与特征，指出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阶级、性别、宗教及种族均不平等的社会。¹⁹刘彼德、张先清、陈慎等还对荷兰人与原住民的关系做了论述。

20

¹⁶ 张彩霞、林仁川：《中国海商：17世纪台海贸易的主导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¹⁷ 黄俊凌：《17世纪上半叶台湾海峡贸易主导权问题新探——以荷兰侵占台湾初期的转口贸易为中心》，《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

¹⁸ 陈思：《从各方史料看颜思齐与李旦及荷兰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5期。

¹⁹ 刘彼德：《17世纪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结构和特征》，《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3期。

²⁰ 刘彼德：《1636年淡水原住民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4期；张先清：《传教、冲突与文化解释——17世纪台湾原住民与天主教的相遇》，《学术月刊》，2013年第12期；陈慎：《从荷文史料看荷据时期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三峡论坛》，2016年第5期。

此外，徐晓望根据何乔远《镜山全集》所载相关史料，分析明末福建商人不热衷于去西班牙在鸡笼、淡水的据点贸易的原因在于：台湾海峡的海盗活动、荷兰殖民者的干扰、福建官府对贸易的限制、闽南商人经商意愿在于台湾南部以及日本锁国政策对西班牙商人的拒绝导致淡水中转港地位的下降等。²¹

明郑时期台湾史研究的进展同样得益于西人文献的发现。陈思借助《热兰遮城日志》的记载，重新回溯了“何斌事件”的来龙去脉，认为该事件是当时郑荷双方在台湾经贸争夺的集中体现，且是 17 世纪 50 年代以后，郑成功对台经贸布局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强对当地大陆商人的影响与控制，挑战荷兰殖民当局，进而控制整个台湾海峡的海上贸易，以便在与荷方的亚洲商业霸权竞争中占据优势。而这一事件的结局则最终促成了郑成功收复台湾。²²张先清、陈忠纯等借助 17 世纪活跃于明郑政权统治区域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利胜的自传，探讨了明郑家族的内外活动以及与教会之间的关系。²³

明郑台湾的儒学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之一。左玉河《明清鼎革之际的台湾儒学》一文讨论了明清之际儒学思想的变迁，认为明郑时期移入台湾的儒学，是与郑成功、陈永华渊源颇深的东林党及浙东学派的经世儒学。它以经学和经世实学为主流，强调反清复明之思想，重视经世实学之复振精神，一扫晚明阳明学空谈心性之学风，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清统一台湾以后，以程朱理学改造明郑时期的台湾儒学，改变其宗旨及内容，淡化其反清复明思想，遂使朱子学逐渐成为清代台湾儒学之主流。²⁴还有学者讨论了明郑台湾儒学人物以及台湾儒学与闽学的关系等问题。²⁵

²¹ 徐晓望：《元代璠求及台湾、澎湖相关史实考》，《台湾研究集刊》，2010 年第 2 期。

²² 陈思：《再论“何斌事件”的前因后果——兼议郑成功收复台湾前的一系列动作》，《台湾研究集刊》，2016 年第 5 期。

²³ 张先清：《17 世纪欧洲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学术月刊》，2008 年第 3 期；陈忠纯：《论传教士利胜与郑氏集团的关系——以利胜的外交使命为中心的考察》，《台湾研究集刊》，2010 年第 2 期。

²⁴ 左玉河：《明清鼎革之际的台湾儒学》，《广东社会科学》，2013 年第 6 期。

²⁵ 如袁韵：《徐孚远与几社的创立与传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 年第 5 期；陈舒劼：《战

此外,邓孔昭对明郑台湾天兴、万年两县的辖境做了新的探讨,质疑以往主张天兴县(州)所管辖的地域就是清初诸罗县的地域,万年县(州)的地域清初则分为台湾县和凤山县,或主张万年所管辖的地域即为清初的凤山县,天兴的地域清初则分为台湾和诸罗二县的观点。他认为天兴县(州)的辖境,包含了清初诸罗县的全部和台湾县的一部分,万年县(州)的辖境则包含了清初凤山县的全部和台湾县的另一部分,并对天兴、万年的分界线走向提出了看法。²⁶邓孔昭还梳理分析了郑经的婚姻和情感生活对郑氏集团的影响,认为由于郑经没有处理好婚姻和情感生活,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的两次内乱。²⁷

如上所属,近十年来,清代台湾史研究成果相当丰厚,这一表现既源于相关研究得到重视,也与大批多卷本的明清宫廷档案与民间文书史料整理出版有密切关联(具体情况参见另节说明)。清代台湾史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清政府对台湾的认知及治台政策的考察,这其中包括平民渡台、土地开发、理“番”、建省等方面的措施。贾小叶《论清人对台湾地位认知之变迁(1661—1875)——以官方为中心》一文,讨论了清政府对台湾地位认知的复杂变迁,并认为以晚清为界发生明显转变:晚清之前,清人思考台湾问题的出发点在于“靖边患”,这不仅反映在康熙用兵台湾的战和决策中,而且反映在清政府的治台之策上。晚清以降,随着外患的进逼,清人对台湾地位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尤其在日本侵台事件的刺激下,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的认知成为时人的共识。与之相应,清政府的治台之策也由此前的“番界”政策转变为“开山抚番”。²⁸陈忠纯讨论了清政府管理民人渡台的“领照渡台”政策的演变,认为清前期的领照渡台制度,初期家眷渡台可能

火中的传承:明郑时期闽台儒学的亲缘关系》,《石家庄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杜维超、张盛文:《实学与闽学在台湾儒学发展中的思想对立及合流》,《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²⁶ 邓孔昭:《明郑台湾天兴万年二县(州)辖境的再探讨》,《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3期。

²⁷ 邓孔昭:《郑经的婚姻情感生活与郑氏集团的两次内乱》,《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3期。

²⁸ 贾小叶:《论清人对台湾地位认知之变迁(1661—1875)——以官方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还未被严厉禁止。康熙五十年前后，由于担心渡台人口增长过快，提出限制“无产业无家室”的单身民人渡台。雍正二年前后开始严格禁止偷渡，领照内容更加细化。此后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几乎禁止新的民人渡台。清廷严禁民人渡台的原因，一是担心台湾人口超过其所能承受的限度；二是怀疑冒险渡台的闽粤穷苦民人品行非良，人数过多将致“无穷之害”。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福康安等人的实地调查让清廷比较客观地认识台湾与民人渡台问题，重新允许单身无业民人渡台，并允许搬眷。至此，领照渡台制度的内容基本稳定下来，直到牡丹社事件后被放弃。²⁹陈忠纯还讨论了清中央与地方关于治台政策的不同主张及其影响。³⁰

李智君阐述了清政府对澎湖的统治政策及效果，认为不同于对台湾本岛的统治，在清政府在澎湖的措施相当成功，在其治理下的 200 余年里，澎湖没有发生一起叛乱事件，社会稳定，人口增长迅速，成为控制台湾的军事基地，有效地制止了海寇对东南沿海的滋扰。³¹

有不少学者讨论了清政府的理“番”政策，李祖基利用其新发掘的张嗣昌所撰的《巡台录》一书，梳理了对大甲西社“番”变事件善后的处理和官方劝垦“番”地的记载，以及减轻台湾田园赋税和开放移民搬眷入台等种种积极的开发措施，由此得出雍正年间政府对台湾的土地开垦政策较之康熙时期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作者认为这种变化与雍正皇帝重视农本，奖励垦荒政策有很大关系。³²刘正刚、乔玉红认为清政府推行土著军事化促进了土著从化外到化内的转变，尤以乾隆末年屯番制和清末“开山抚番”较为典型。在台湾历次军事行动中，土著几乎都与官府并肩作战，彰显了王朝军事化的成功，土著社会在军事化过程中认同了王朝统治，

²⁹ 陈忠纯：《清前期平民领照渡台的范围探析——兼议限制渡台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2期。

³⁰ 陈忠纯：《雍正时期闽台地方官治台主张探析——以沈起元的治台论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6期；《19世纪初期闽台地方官开发台湾东部“番地”的主张探析——以噶玛兰及水沙连地区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5年第4期。

³¹ 李智君：《海洋政治地理区位与清政府对澎湖厅的经略——以风灾的政府救助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1期。

³² 李祖基：《论雍正年间台湾“番”地开垦政策的变化——以〈巡台录〉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3期。

也完成了从化外到化内的转变。³³刘耀、陈文新利用朝鲜使者的记录，阐述了清代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参加贺寿朝觐活动的。³⁴孙炜根据黄叔璥所撰的《台海使槎录》的记录，认为清政府针对“生番”“熟番”，分别确立了防、抚两种治理策略，力图用“番界”将其固定在各自的生活范围里。从实践上看，这两种策略都具有消极性，延缓了台湾的开发和发展，间接导致了清治台期间“番”民冲突不断的不良后果。³⁵

台湾建省问题是另一个研究重点。贾小叶注意到清政府在台湾建省问题上，“幕后”的人事关系是影响台湾建省决策的重要因素。她认为沈葆楨提出台湾巡抚人选与驻台办法时，其个人经历与人际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后，不同的主持者因个人经历与人际交往的不同，对沈葆楨的方案提出大小不同的异议，导致良好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得到有力地推行。中法战后，巡抚驻台之议再起，各人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没有超出日本侵台后的相关讨论。而最后选定的台湾建省，也与沈葆楨的巡抚驻台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从日本侵台到中法战争，台湾建省问题整整经历了十年的讨论与反复，才得以尘埃落定。这其中不仅暴露了地方督、抚之间的推诿、因循，更暴露出晚清中央政府的腐败与无能。³⁶郑永华说明了1980年北京出土的“镇守福建台湾等处总兵官之关防”的背景，借以说明晚清台湾建省的曲折过程及清代中央政权逐步加强台湾地区管辖的历史进程。³⁷

1874年牡丹社事件及其中的“番”界主权问题，备受大陆学界重视。李理认为1874年的出兵侵台事件是日本近代对外殖民扩张及军国主义的源起，而其幕后的指使支持者是美

³³ 刘正刚、乔玉红：《从化外到化内：清代台湾土著军事化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社版），2010年第1期。

³⁴ 刘耀、陈文新：《朝鲜使者笔下的台湾原住民贺寿朝觐活动述略》，《东疆学刊》，2016年第10期。

³⁵ 孙炜：《防抚之间：清政府对台湾原住民的认知及应对——〈台海使槎录〉所反映的清前期治台政策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2期。

³⁶ 贾小叶：《晚清台湾建省的台前与幕后》，《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

³⁷ 郑永华：《未经启用的台湾总兵关防与晚清台湾建省之波澜》，《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光绪三年新铸台湾总兵关防考论》，《历史档案》，2017年第2期。

国。“山原号难船事件”本为普通的海难事件，但在美国人的挑唆下，却成为日本出兵侵略台湾的借口。而日本出兵台湾，以为琉球民伸张正义为借口，实质却为切断中国与琉球的藩属关系，以达到最后“吞并琉球”的目的。³⁸

张卫明从清政府援用国际法处理牡丹社事件的过程中，看到中西方不同认知的冲突与调和。他注意到在 1874 年台湾漂民案中，知识精英和东南督宪借助奏折、照会和报刊等介质，首次在晚清外交中构建起国际法话语圈。论者广泛援引万国公法，形成诸如强调领土不容侵越、属地原则下番地自治、指责日本踞台及索赔、禁止局外对日援助、保护在日华侨、请求国际仲裁之类的观点和建议。他认为公法舆论不仅迎合了清政府“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的对日交涉策略，而且呼应甚或引导政府决策与军事外交。以天下体系为圭臬，晚清中国对国际法采取选择性采择，内在地削减了由“实效管辖论”所造成的国际公法与天下体系之间的紧张与张力，展现了东西方国际秩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³⁹连晨曦也认为 1874 年台湾事件对晚清国家主权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它迫使清政府对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对外观念进行修正。在列强的不断冲击下，清政府终于将“万国公法”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武器，并逐步将国内各民族一视同仁地对待，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大转变，它对于今日的中国仍然具有借鉴意义。⁴⁰对此，贾益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分析了清廷对牡丹社事件中日人提出的“番地无主论”的应对，认为经过此次外交挑战，清廷上下对台湾“番民”、“番地”与中国主权的认识，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并非出于对西方“万国公法”的认同，而是传统体系内部的适当调整。另一方面，为应对边疆危机而把“番地”逐渐纳入“腹地”的行动，在近代条件下，成为中国逐渐由“天下”走向“万国”之一的重要一环。⁴¹

³⁸ 李理：《1874 年日本出兵侵台的幕后指使者》，《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 年第 6 期。

³⁹ 张卫明：《借法异域：1874 年台湾漂民案中的国际法话语建构》，《台湾研究集刊》，2014 年第 1 期。

⁴⁰ 连晨曦：《1874 年台湾事件与晚清国家主权观念的转变》，《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 年第 2 期。

⁴¹ 贾益：《1874 年日军侵台事件中的“番地无主”论与中国人主权观念的变化》，《民族研究》，2009 年第 6 期。

关于“生番”地界的问题，李智君从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的角度作了论述，他认为西方殖民者的出现，使得原本由中国主导的东亚传统的地缘政治关系和海上国际救助体系，被彻底打破。尤其是英国入侵后，原本是大清国通过海上救助“宣示圣恩，俾该国之人咸知我皇上怀柔怙冒之至意”的区域，转眼间变成了各国相互厮杀的战场。原本被列为“化外之民”的台湾原住民，因他们生存的“化外之地”，有别于清政府建章立制的“教化之区”，而成了西方列强急于趁机掠取的“无主空间”。清政府被迫改变现状，“开山抚番”，以保住外洋岛屿。⁴²

清代台湾经济史的成果不算多，徐晓望、徐思远从宏观上研究了明清时期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形成的关系，他们认为，明朝海禁后，闽粤海洋文化向环中国海区域传播，构成以闽粤人为核心的海洋贸易网络。台湾作为闽粤海洋网络的一个枢纽，从其海洋经济发生的一开始，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巨大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闽粤的重商文化，培育了台湾的商人阶层；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殖，是台湾海洋经济产生的原因，也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中国前列的根本因素。⁴³

杨彦杰利用晋江东石蔡氏的家族文献，结合地方史志以及田野调查等资料，对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布袋嘴的鱼塭经营进行纵向考察，同时就此个案反映出的股权经营形式进行探讨。他认为，清代台湾的鱼塭经营有多种股权形式，一种为长期合股经营，另一种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更为复杂的股权形式，如蔡氏经营的北中横塭就有塭底份（大税）、塭佃份（小税）、现耕塭份，以及承包者再行转贖的塭份等。这些不同层面的权力，既与土地经营有某种关联或类似性，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⁴⁴

有关清代台湾社会史、文化教育及宗教信仰方面的著述不少。社会史方面所涉及的问题

⁴² 李智君：《无远弗届与生番地界——清代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与外洋国土理念的转变》，《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⁴³ 徐晓望、徐思远：《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1期。

⁴⁴ 杨彦杰：《百年鱼塭：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的鱼塭经营》，《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6期。

主要有原住民与汉人、移民与台湾社会变迁等关系；文教民俗方面则涉及了台湾科举、书院教育、台湾儒学、神明信仰等问题，尤其注重探讨闽台文化渊源等关系。

邓孔昭研究了清代的女性移民问题，认为经历雍正十年到乾隆四年、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的两次搬眷，对于缓解台湾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状况有很大帮助。镇压林爽文事件后，清政府取消了禁止携眷的政策，台湾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状况进一步缓解，人口的大幅度增长，除了移民增长，人口的自然增长也应该达到较高的水平，说明人口的性比例已经比较平衡。⁴⁵

董建辉、周慧慧考察了清代台湾埔里盆地的族群构成的变化，指出人口迁移、土地资源竞争是影响这一时期族群关系的主要力量。埔里盆地的先住民为埔、眉二番社。清中期，平埔族群开始迁入，形成多族群杂居共垦的局面。之后，平埔族群不断蚕食先住民的土地资源，导致其生存空间严重压缩，最终难逃被同化或他徙的命运。清末实施“开山抚番”政策，吸引汉人大规模进入盆地开垦，平埔族群逐渐失去其优势地位，并开始走向汉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此后当地族群关系的格局。⁴⁶

张侃、董丽琼依据契约文书、总督府调查文献等材料，考察了雍正、乾隆年间，以胡焯猷为首的汀州籍客家移民在淡水河流域开展的垦殖活动。他们认为客家移民面对“边疆社会”的潜在风险采取了有效的生存策略，主要依靠从原籍带来合股经营等方式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应对垦殖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在垦殖过程中，移民们超越族群、地域、血缘的限制，与其他社会群体产生多元的文化互动，共同构建如书院、庙宇、家族等经济—文化共同体，形成了社会合成机制，在不同的历史情势中转化出不同的社会身份。⁴⁷

谢重光则阐释了清代台湾客家义民的性质，认为客家义民是乡村团结自保的民间武装，

⁴⁵ 邓孔昭：《试论清代台湾的女性移民》，《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5期。

⁴⁶ 董建辉、周慧慧：《移民、土地与清代埔里盆地的族群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⁴⁷ 张侃、董丽琼：《清代台湾北部的汀州客家移民合作垦殖和共有形态论析——以契约文书等文献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

其首要的第一位的任务是保卫家园，在历史上起到稳定地方秩序的作用，是保护社会安定的力量。⁴⁸

孔潮丽对洪丽完编著的《台湾社会生活文书专辑》作了较深入的解读，总结清代台湾家庭收养呈现出几方面鲜明的特征：一是异姓承继相当普遍，“异姓不相为后”传统伦理规范得不到贯彻执行；二是父权在清代台湾社会仍然影响深远，送养权的执行，归根结底就是父权的行使、延续和转移；三是收养与送养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近现代为子女利益的收养大相径庭；四是非法收养现象极为常见，与台湾地区特殊移垦社会环境不无关系，也折射出国家制度与民间实践之间的强烈反差。⁴⁹蒋小波通过考察台湾早期的节烈故事，认为这些故事主要和明清易代之际的政治动荡有关，并体现了史传作者的家国之痛。清政府治台之初就大力提倡节孝，一方面是为了将台人对明郑政权的感念转化为对新政权的认可与支持，同时也出于治理台湾移民社会之风化问题的现实需要。随着清政府旌表范围与规模的逐步扩大，台湾的节烈妇女在人数上急速上升。同时，清代台湾的节烈妇女具有较广泛的社会代表性，透过她们的节烈故事，可以看到当时台湾的社会状况与妇女生活的情状。⁵⁰

黄铭松试图根据西文资料解读 19 世纪末期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样貌。从西方学者的记载来看，彼时的台湾岛除西台湾外，清政府的控制力还显得比较薄弱。在南台湾和东台湾地区，原住民的族群关系仍然相当紧张。中部高山地区基本处于闭塞状态，原住民番社之间的猎头行为普遍，部落人口锐减。可以说，原住民大多处于自我治理状态，其社会组织已有较大发展，具体表现在每个村社都有头目，有些部落有年龄阶层组织，并且不少地区形成了

⁴⁸ 谢重光：《清代台湾客家六堆义民的评价问题》，《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3期。

⁴⁹ 孔潮丽：《清代台湾家庭收养初探——基于〈台湾社会生活文书专辑〉的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⁵⁰ 蒋小波：《贞节与政治：节烈故事与清代台湾的妇女生活》，《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4期。

较强的部落联盟。在清治后期施行的“开山抚番”政策影响下，原住民与政府及汉人的关系日趋紧张，大庄事件及加礼宛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的案例。⁵¹

清代闽台关系方面，徐晓望论述了晚清福州与台北的关系，他认为，自清代中叶起，台湾北部与福州之间的贸易开始发展，尤其是清代晚期，淡水、基隆与福州之间的船舶运输，已经成为闽台之间重要的贸易航线，每年都有近 300 船次的贸易。由于晚清福州港的繁荣，对台湾北部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同时，台湾北部的发展，也给福州带来很多的机会，福州人纷纷到台湾谋生，台北也成为福州商品的主要市场之一。⁵²

文教方面，李祖基研究了清代台湾科举中的“冒籍”现象，指出清代前期，闽粤移民冒籍赴台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相当普遍，台湾地方官员对此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闽省官员和巡台御史曾对其进行查禁和清理。但成效不彰。他认为科举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台湾这一边陲地区人口的文化结构。有的科举移民及其后裔还参与台湾的土地开发和文教设施建设，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地方文教事业中作出贡献。清代前期台湾的科举移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一现象表明，海峡两岸人民之间除了地缘、血缘的关系外，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⁵³杨齐福探讨了台湾举人与清代台湾社会的关系，指出作为台湾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举人积极参与各种文教活动，推动了台湾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⁵⁴

民俗宗教方面，学者比较注重研究源于大陆的信仰在台湾的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转变。刘大可分析了台湾客家信仰的特点，认为台湾客家民间信仰一方面大致承袭了大陆原乡的信仰特色，体现了两岸客家民间信仰的共同特征，但另一方面台湾客家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民俗

⁵¹ 黄铭松：《19 世纪末期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以西文资料为中心》，《三峡论坛》，2017 年第 5 期。

⁵² 徐晓望：《晚清福州与北台湾的城市化建设》，《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0 期。

⁵³ 李祖基：《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 年第 1 期。

⁵⁴ 杨齐福：《台湾举人与清代台湾社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 年第 4 期。

文化，也随着移民社会的演变而发生了某些适应性的改变，受不同的时空背景影响，而呈现出自己的信仰特点。这种既传承又有所变化和吸收的双重轨迹，是台湾客家民间信仰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移民文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交融和理性选择的一种结果。⁵⁵谢重光考察了惭愧祖师信仰在台湾传播的特点，指出惭愧祖师信仰由客家原乡辗转传至台湾，祖师身世、功能、神性、形象乃至信众族群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民到南投县拓垦之初，榛莽未辟，瘴疠肆虐，生番为祸，毒蛇、猛兽横行，缺医少药，缺乏安全保障，所以诸如御番、保生、降服毒蛇猛兽和一切妖魔鬼怪之类，都是垦民生产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都希望有神灵加以保护。他们奉迎而来的是惭愧祖师，惭愧祖师本无这些功能，他们就把原乡流行的三平祖师、保生大帝、三山国王等神祇的功能加到惭愧祖师身上。所以说这样的迭加，既与垦民原乡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关，又与垦民新居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攸关。⁵⁶

（二）研究专著、论文集概况介绍

检索大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笔者总共收集到 19 部有关近代以前台湾史的专著或论文集。这其中，有关早期台湾史有 4 部，明郑台湾史有 6 部，清代台湾史有 6 部，另有跨主题的个人论文集 3 部。以下简要介绍其中的几部著述。

李祖基、陈忠纯合撰的《社会转型、抗击外侮与近代化建设——晚清台湾历史映像（1840-1895）》对晚清台湾史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是大陆地区最早的一部专门论述晚清台湾历史的著述。⁵⁷该书的重点主要有晚清台湾开埠与外贸的发展及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⁵⁵ 刘大可：《传承与变迁：台湾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 年第 1 期。

⁵⁶ 谢重光：《惭愧祖师身世、法号、塔号、信仰性质诸问题及其在台湾传播的特点试析》，《世界宗教研究》，2012 年第 4 期。

⁵⁷ 李祖基、陈忠纯著：《社会转型、抗击外侮与近代化建设——晚清台湾历史映像（1840-1895）》，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年。

清政府治台政策的转变与台湾建省,台湾移民社会的转型,以及外敌的入侵。全书分成十章,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台湾军民的抗英斗争”“通商口岸的开放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移民社会转型”“西方列强对台湾的觊觎与侵扰”“牡丹社事件”“清廷治台政策的转变与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开始”“外贸对晚清台湾社会经济之影响”“中法战争之台湾保卫战”“台湾建省与刘铭传的近代化建设”“反对日本占领台湾的斗争”等。

邓孔昭教授所著《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一书,集合了作者多年研究郑成功与明郑历史的成果,尤其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斗争及明郑与台湾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⁵⁸该书不仅论述了郑成功的爵号由来、对郑芝龙遗产的批判继承、收复台湾的战略运筹以及指挥作战的特点,还探讨了明郑台湾的行政建置、社会经济,以及明郑与清政府、荷兰殖民者的关系。最后,该书还讨论了与清统一台湾的重要人物与主张。

陈支平教授的《台湾文献与史实》,是在作者近年搜集海内外涉台文献的基础上,着重于介绍以往较少为人关注的文献资料,或对其中稀缺孤本(如《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师中纪绩》《闽颂汇编》《难游录》《靖台实录》《台阳百咏》等)的史实分析,或依据新发现史料讨论清代台湾平埔族与汉人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或对民间族谱及其他杂书的史料解读。⁵⁹

张崇根教授撰写的《台湾史前史与早期史》,是其旧著《台湾四百年前史》的修订版。⁶⁰作者在尽可能运用台湾考古学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了自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至明天启4年(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南,长达3万多年的台湾历史。作者将台湾古史分成“采集渔猎时期”“刀耕农业时期”“锄耕农业时期”“铁骑时代”“三国时期的山夷”“隋唐时期的流求人”“宋代的毗舍邪人”“元代的汉人与琉球人”“明代的东番人与汉族移民”等时期,借以阐述“台湾的居民、台湾3万年以来的文化”与大陆的渊源关系,以及“海峡两

⁵⁸ 邓孔昭著:《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

⁵⁹ 陈支平著:《台湾文献与史料钩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⁶⁰ 张崇根著:《台湾史前史与早期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

岸人民、文化是如何交流、互动的”。

周云中的《正说台湾古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对清代以前大陆文献记载中的涉台内容做了考订与辨证，并探讨两岸关系的相关史事。⁶¹作者提出应注意大陆与台湾关系史有官方与民间两个层面，历史上大陆与台湾之间航路的发展，他认为台湾在明代之前已经进入世界贸易圈，而近代以后，东西方的海上势力在台海地区的交汇，塑造了台湾在世界政治地理格局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

论述闽台历史关系方面的论著也比较多。如汪毅夫所撰的《闽台地方论稿》，发掘了不少比较罕见的闽台历史的零散民间资料，并进行细致的整理和研究，补充原有史料的不足，订正部分既有研究的错误。⁶²许维勤在其所著《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一书中，梳理了福建与台湾行政关系发生、发展、变化和延续的过程，指出闽台行政关系的产生，“既是一种基于地理关系的历史必然，又是其他各种关系得以深化的重要基础”。⁶³作者认为一方面应该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角度认识台湾开发的过程，一方面也应从近现代国际政治秩序震荡和重构的高度，分析台湾主权归属的明确过程。徐晓望的《早期台湾史考证》一书，收录了其撰《沉东京、浮福建》与闽台古文明起源的假说《论吴隋二代台湾移民进入大陆南部》、《梁嘉彬“流求论”的成功与失误》等文章。⁶⁴

论文集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的《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康熙统一台湾 33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是在该中心举办的“纪念康熙统一台湾 33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基础上，集合部分参会论文编辑出版的。该论文集内容相当广泛，基本反映了新世纪以来大陆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⁶⁵

⁶¹ 周运中著：《正说台湾古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

⁶² 汪毅夫著：《闽台地方论稿》，福州：海峡书局，2011年。

⁶³ 许维勤著：《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⁶⁴ 徐晓望著：《早期台湾史考证》，福州：海风出版社，2014年。

⁶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康熙统一台湾 330 周年国际

由邓孔昭教授主编的《闽越移民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一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档案、方志、族谱等文献资料，选择以往较少关注的问题做了探讨，如荷据时期台湾汉族移民与荷兰人、原住民的关系，还有清代女性移民、汉族移民与原住民通婚状况、康雍年间台湾移民的婚姻与家庭等问题，推进了学界对清代以前（以清代为主）大陆移民台湾的过程及其与台湾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认识。⁶⁶

（三）涉台史料出版概况

近十年来，大陆台湾史研究最值得提及的一个成果就是涉台史料的整理出版，成果十分丰硕。首先要提到的是邹爱莲主编的《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该套史料丛书是“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明清档案出版项目之一。⁶⁷全书230册，按编年体例影印出版，设总目2册，汇总列于书首。各册目录，另行分别列于各册。书中辑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两朝台湾问题档案总计16343件，其中明代档案主要选自兵部题行稿，共25件；其余选自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台湾档”、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清代档案。其内容包括郑氏逐荷、康熙统一、乾隆平定、台湾开埠、台湾设省、乙未割台等重大事件，还有政制设置、官员任免、移民开发、汉“番”关系、海疆防务等诸多闽台地大小政事。这些档案记载了明清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台湾的真实情况，全面反映了台湾300多年间的历史变迁和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推动明清台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编辑的《明清宫藏闽台关系档案汇编》（下称“闽台关系汇编”），该汇编共30册，在上述《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下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

⁶⁶ 邓孔昭主编：《闽越移民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⁶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

称“台湾档案汇编”)基础上,补录了2000多件馆藏档案。⁶⁸“闽台关系汇编”除了进一步丰富“台湾档案汇编”的内容,还特别注重体现清代福建与台湾的军事统属及科举考试关系,如收录有关闽台之间的“班兵制”、福建乡试题名录中见载台湾各县考生名单等相关文献。

由方宝川、谢必震主编的《台湾文献汇刊续编》(下称“续编”),是在《台湾文献汇刊》的基础上,按其体例,进一步收录了之前未及时编入的部分其他知见史料,历10年之功编成。⁶⁹“续编”分成八个专辑,汇录了大量明清以来有关台湾的诗文集、专题文献史料、輿志风俗、公私文书、民间契约,谱牒家乘、罕见台湾刊物等,凡150种,共100册,内容相当丰富。

陈支平负责主编的《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也是“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的组成部分之一。⁷⁰该套文献选编以民间私家收藏的涉台契约文书、籍账、碑文及民间教科书、宗教科仪等册籍为主要内容,还收录了部分清代官衙文书抄本、家族文书、日记等资料。其中,有台湾中部契约文书、杨同兴家族文书及族谱、泉州鉴湖张氏家族涉台文书、台湾民间教育文献及《水竹居日记》等,清代官衙文书则包括文武衙门簿、北路理番分府票簿、彰化县主成票簿、彰化县主案簿、北路理“番”分府案簿、北路理宪案簿、岸里社守土随军“番”勇清册等。

《台海文献汇刊》由萧庆伟、邓文金、施榆生主编,该史料丛书是在“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明清馆藏台湾档案汇编》《馆藏民国档案汇编》和《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开拓文献资料编辑而成。⁷¹丛书主要包括“台湾义勇队档案文献集成”“台海诗文集”“海疆文献丛编”“民国时期台湾罕见刊物丛编”等四部分,总共60册。其中包括了之前尚未公开的台湾义勇军地方档案、从日本内阁文库收集的有关郑芝龙海商集团的《经国雄

⁶⁸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明清馆藏闽台关系档案汇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

⁶⁹ 方宝川、谢必震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续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⁷⁰ 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⁷¹ 萧庆伟、邓文金、施榆生主编:《台海文献汇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

略》等涉台史料。

《闽台族谱汇刊》《闽南涉台族谱汇编》分别由陈支平与萧庆伟、邓文金、施榆生主编。

《闽台族谱汇刊》共 50 册，收集闽台地区民间族谱计 106 部，时间跨度自明代隆庆四年（1570 年）编纂的族谱《水美王氏族谱》直至当代的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 400 余年；⁷²《闽南涉台族谱汇编》共 100 册，以族谱涉及闽台关系为原则，汇集闽南地区涉台民间族谱计 100 种，大部分修纂于清代和民国年间，有少数修纂于明代及当代。⁷³

此外，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选的《民国时期台湾经史文献选编》也收录了部分民国时期有关台湾史的文献材料。

除了上述大型的文献史料丛书，还有其他较小系列或单种点校史料。如九州出版社策划的“中央政府管理台湾历史文献丛编”，迄今已出 4 种，包括尹全海主编的《清代福建大员巡台奏折》（2 册）《清代巡台御史巡台文献》（1 册）《中央政府赈济台湾文献》（分清代、民国两卷，共 2 册）和王鸿鹏主编的《台湾科举史料汇编》（2 册）。尹全海所编的 3 部史料集，分别以清代巡台御史、清代福建大员轮值巡台的奏折等资料，以及清代及民国中央政府的赈济台湾相关原始文献的史料选编奏折等档案文献为资料来源；⁷⁴王鸿鹏则依据 200 余种台湾史料，从中遴选出科举史料，按照制度沿革、学校与选举、题名录、人物、艺文等五部分编辑成册，力图全面真实地反映台湾科举全貌。⁷⁵这 4 部史料集的编撰目的均在于推进有关清政府及民国政府对台湾的治理措施与政策的研究。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李祖基教授整理并点校的《行间记略·清威略将军吴英史略》一

⁷² 陈支平主编：《闽台族谱汇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⁷³ 萧庆伟、邓文金、施榆生主编：《闽南涉台族谱汇编》，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

⁷⁴ 尹全海主编：《清代巡台御史巡台文献》，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清代福建大员巡台奏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中央政府赈济台湾文献·清代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年；《中央政府赈济台湾文献·民国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年。

⁷⁵ 王鸿鹏主编：《台湾科举史料汇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年。

书，该书重现了久已湮没的吴英史料，对于研究明郑及清统一台湾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⁷⁶

总体而言，近十年来，大陆的台湾史研究（通史及近代以前部分）无论在广度或深度均有长足的发展，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清代台湾史得到长足的发展，无论各类资料整理或是学术著述，均有颇为丰厚的成果。其中，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受到学界的重视，相较而言，经济史研究的热度有所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学者对原住民研究兴趣较之以往更加浓厚，显示大陆台湾史研究日趋多元且深入。当然，通过论文统计还可看出两岸关系史研究所占比例较高，其原因除了特定时代促使大陆学者重视研究和重现两岸的历史联系，也有大陆学者所拥有的文献资料等研究条件更利于从事相关主题的研究。

同时，大陆地区的文献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显示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前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深入，而学术研究的进步，也进一步刺激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加强完备。无论是官方的档案文献，还是民间的契约文书，都有不少的成果。此外，两岸学者学术交流的成果也不断增多，在检索中，笔者发现了不少台湾学者在大陆发表的著述。而大陆学者利用台湾等海外整理的文献史料，也早不鲜见了。

就目前的情况看，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涉台史料的整理收集范围需要继续扩大，相关数据化建设也有待加强。近年大陆涉台史料的搜集整理虽然成果丰硕，但大陆台湾以外的海外文献搜集还不够。台湾作为中国东南海疆的最前沿，历史上曾面临多重势力的侵袭，也因此向日人及西人文献中留下数量颇多的记载。这些资料对于台湾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亟待进一步搜罗整理。“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列有“海外遗存台湾文献选编（共 50 册）”，尚未正式出版。期待该套史料汇编能尽快完成，并推动海外文献搜集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文献资料的整理方面有待加强的另一个问题是相关数据库建设稍显滞后。未来如果能整合

⁷⁶ 【清】吴英撰，李祖基点校：《行间记略·清威略将军吴英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年。

各类文献资料,依据学术研究的需求,建立台湾史研究的综合数据库,将使得研究更加便利。

其次,虽然大陆的台湾史研究强调从中国史的视野看待两岸关系,但总体而言,台湾史研究与整个历史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史研究,衔接还不够紧密。过去二三十年间,大陆的中国史研究发展更新有目共睹,但台湾史研究对于相关历史研究成果的借鉴显得不足。尤其,近年中国史研究逐渐注重从全球史的视野,检讨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但相关大陆地区的台湾史研究很少从全球史或东亚史的角度,解析大陆与台湾的历史联系。未来如何应对来自两岸乃至全球史研究视野更新的挑战,是大陆台湾史研究者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最后,大陆台湾史研究应该继续突出“两岸特色”。如陈孔立教授所言,台湾史研究应立足于两岸互动的基础上,以做到“了解之同情”。